

宿 白 未 刊 讲 稿 系 列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力
封面设计：李 红
责任印制：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宿白著.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2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ISBN 978 - 7 - 5010 - 2650 - 0

I. 张… II. 宿… III. 中国画 - 绘画史 - 中国 - 古代
IV. J21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357 号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宿白未刊讲稿系列)

宿 白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100007)

http: //www. wenwu. com

E-mail: web@wenwu. 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6 开 印张: 5.5

ISBN 978 - 7 - 5010 - 2650 - 0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一	张彦远的家世及其时代	(1)
	(一) 张氏郡望	(2)
	(二) 彦远先世	(5)
	(三) 彦远经历	(7)
	(四) 张家的收藏	(9)
二	《历代名画记》的流传与整理	(15)
三	《历代名画记》体例与内容	(22)
四	《历代名画记》的续作及其他	(32)
五	《历代名画记》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	(39)

一 张彦远的家世及其时代*

《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官宦家庭出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艺术类》一于张彦远另一本著作《法书要录》条下，录有一段关于他的身世和事迹：

《法书要录》十卷，唐张彦远撰。书前有彦远自序，但署河东郡望。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晁公武《读书志》亦但称其字曰爱宾，而仕履时代皆不及详。今以《新唐书·世系表、艺文志、列传》与彦远《自序》参考，知彦远乃明皇时宰相嘉贞之元（玄）孙。《序》称高祖河东公即嘉贞，其称曾祖魏国公者为同平章事延赏（案，延赏封魏国公，本传失载），称大父高平公者为同平章事宏（弘）靖，称先公尚书者为桂管观察使文规，《唐书》皆有传……本传称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中至大理寺卿，《艺文志》亦同，而《世系表》作祠部员外郎，则未详孰是也。

《总目提要》在《法书要录》之后，接着著录彦远《历代名画记》云：

《历代名画记》十卷，唐张彦远撰。《自序》谓家世藏法书名画，

* 《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是2001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汉唐考古研究课中的一项讲题的讲稿。原稿一再修订，字迹杂乱。课后李志荣同志曾就课堂记录整理清抄，并拣选部分有关图版，此次刊布即据李本付印。

收藏鉴识自谓有一日之长。案《旧书》称彦远之祖宏（弘）靖家聚书画侔祕府。李绰《尚书故实》亦多记张家书画名迹，足证《自序》之不诬。故是书述所见闻极为赅备。

《总目提要》这两段文字，是最早整理张家家世历史之作。上世纪 30 年代迄 50 年代初，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于卷十四《法书要录》条据《旧唐书》、《郎官石柱题名》和《唐文粹》所收《三祖大师碑阴记》等，为《总目提要》文字补辑。现依余氏《辨证》所辑和张氏两书中所记事迹及两《唐书》其他纪传的记事以及此外的零散资料，为《总目提要》增补张氏郡望、彦远先世、彦远经历和张家收藏四项如次。

（一）张氏郡望

《法书要录》彦远《自序》署其为河东郡望（即今山西中南部。郡望，一郡之大姓）。除此外，又见《唐文粹》卷六三所录《（舒州三谷寺）三祖大师（镜智）碑阴记》末题：“咸通二年（861 年）八月舒州刺史河东张彦远书于碑之阴”^[1]。这就是说，他标榜其河东郡望不仅是《法书要录》。所以这一点是不会有错误的。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

河东张氏，本出晋司空华裔孙吒子，隋河南郡丞，自范阳徙居河东猗氏。（今山西临猗县境）

这里提出：张氏郡望并不是河东，而原是从范阳来。彦远高叔祖名嘉祐，在天宝初年亡故。请一位真正的河东郡望柳贲作墓志，柳却题墓志作《唐故左金吾将军范阳张公墓志铭》。墓志铭开头也说：“公讳嘉祐，范阳人，相国河东公（嘉贞）季弟。”（《全唐文》卷三五八）张嘉贞即张彦远高祖。可见，玄宗天宝时，真正河东郡望的柳贲还没有承认张家是河东

人。不仅在盛唐时，就到中唐宪宗初（9世纪初）时，《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S. 2052）里还把张姓列在幽州范阳郡九姓之中。而“蒲州河东郡出十五姓”中也没有张姓。其后《元和姓纂》也还是照旧姓氏书著录无改变，说，张姓，范阳郡望。由此可见，唐朝人有重郡望不轻易改变的传统。唐以后，由于不断地出现大规模的变乱、迁徙，对郡望的传统看法比起中唐以前就逐渐削弱了，所以张彦远在晚唐才自己署为河东郡望。当时大约有以下三个因素：

（1）张家由范阳迁到河东猗氏，到张彦远已历九世，从隋末算起到张彦远写书时止，已有二百五十多年了；

（2）张家从彦远高祖张嘉贞始，三世相唐，张嘉贞又被封为河东侯，于是当时就有人称其为河东公；张家任三品以上官到彦远已五代，家世煊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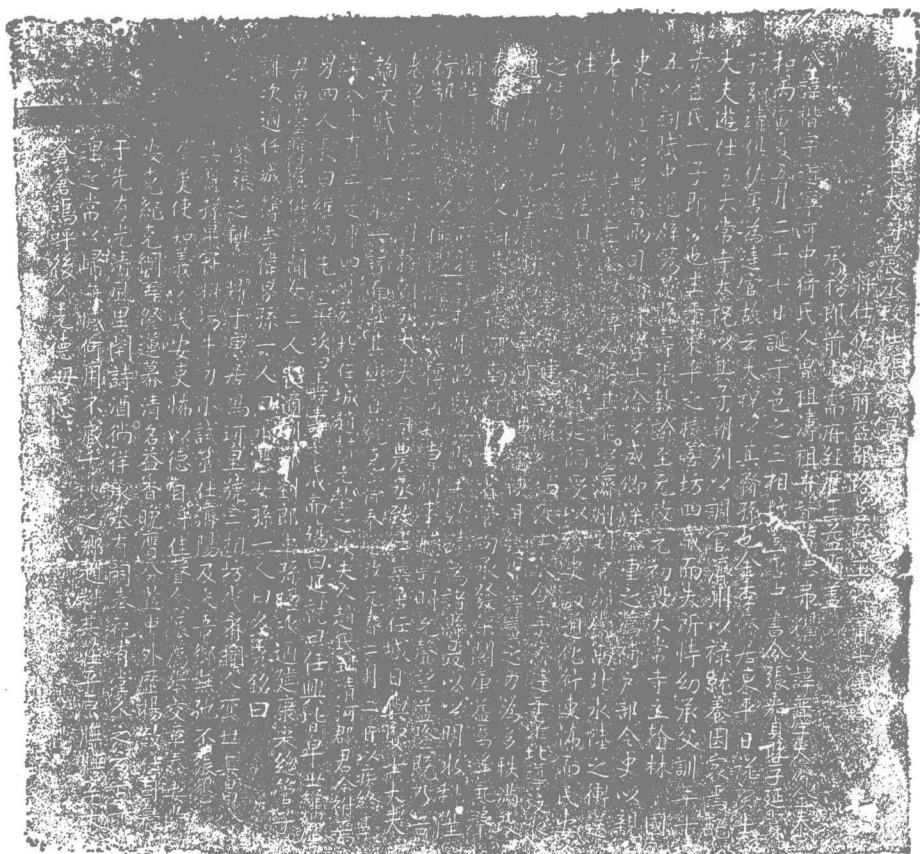
（3）张家虽然在两京和大州地方作官，猗氏乡里还有旧居，多聚族人。

《雍正猗氏县志》卷一〈坊巷里都〉条记：

邑城内有四坊……三相坊，城内西南地。唐三相旧居故名。

雍正县志所记据云源于旧志。旧志是指万历、康熙的两县志。但是，明清志书记载唐宋事迹必须另有实证，不能轻易相信。

1989年，山东济宁发现了元泰定元年（1324年）张楷墓，墓志载其为唐张嘉贞后裔：“公讳楷字道宁，河中猗氏人……。父讳普，字大济，金泰和丙寅（六年，1206年）夏五月二十七日诞于邑之三相坊，盖唐中书令张嘉贞暨子延赏、孙弘靖俱佐唐为达官故云。”（《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年第9期）这块墓志记楷之父普其生地猗氏三相坊（图一）。因此，我们知道明清《猗氏县志》所记的三相坊，应至晚还有13世纪初的文字根据，所以三相坊地名、地点为唐以来张家旧居所在，就有



图一 张楷墓志拓本（《考古》1994年9期822页图七）

相信的可能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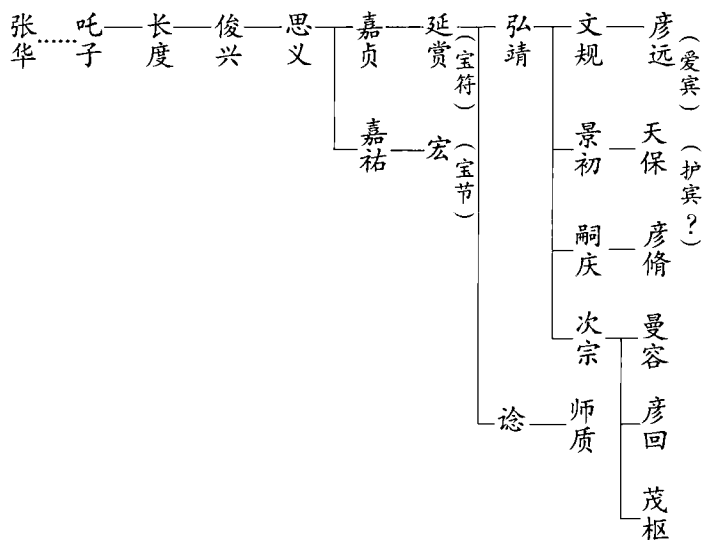
《雍正猗氏县志》卷六〈邱墓〉还记载：“张嘉贞、张延赏、张弘靖三相墓在城外西南隅”。这一条记录三相冢墓在乡里，虽然更重要，但无其他证据，既不见更早的记载，又无实物发现。前引柳贲所作《张嘉祐墓志》讲：“（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月甲辰终于安邑里（西京东市南）私第……以天宝元年（742年）二月甲辰，迁窆东都汉原”。嘉祐卒于西京，迁葬东都，因为张家主要府邸在洛阳的思顺里，并没有归葬猗氏。那么如何证明其兄及之侄儿归葬乡里？所以这条更重要的记载就只能存疑了。

以上旨在说明，北方用明清方志材料所记载的唐宋事迹，引用要慎重，一定要有可靠的旁证方可。

总之，迁徙时间久，家世煊赫，乡里一直保有宅第为族人聚居，这三点可能是彦远改署郡望的根据。彦远改署郡望也正说明当时（晚唐，9世纪中期）对以前不易改变郡望的做法已有某些松动了。所以到10世纪中期的五代后晋时修的《旧唐书·张嘉贞传》就迳记：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其实张嘉贞本人在盛唐时是不大可能说自己是河东人的。到了11世纪的北宋，人们对郡望的看法已大不同于唐代，所以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在《宰相世系表》中，认可了“河东张氏”，同时在《表》和《张嘉贞传》里又交代了其为“范阳旧姓”及“徙居河东”，“遂家蒲州为猗氏人”这更改郡望的过程。

（二）彦远先世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下等资料列河东张家世系表如下：



彦远先世的发迹始于张嘉贞。张嘉贞，弱冠应五经举，有文武材。8世纪初武则天后期长安中受知于武后，拜监察御史（正八品下），是个分察百僚的官。不久迁兵部员外郎（兵部是尚书省六部之一，员外郎从六品上；官品虽低但很重要，可以放外任作刺史，然后再调入京城做更重要的官）。开元八年（720年）从并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进到中央，做中书侍郎（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任中书令（正二品）。开元十一年（723年）免相，封河东侯，故称河东公。开元十七年（729年）卒。《两唐书》有传。

嘉贞季弟张嘉祐，弱冠武举及第，出为边府官，有干略；开元时，因嘉贞之请内调，寻拜右金吾将军（从三品）；时“兄相弟将一门双美”。后因赃污，外贬浦阳府折冲都尉（正五品）。开元末，任相州刺史（从三品），不久入迁左金吾将军（从三品）。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卒。有传附在《张嘉贞传》后。《全唐文》卷三五八收有柳贲撰的墓志。

张延赏，是张嘉贞晚年所得子，原名宝符，天宝初赐名延赏，有文武才。德宗初两度拜相，贞元三年（787年）卒。《新唐书》本传里记：“延赏更四镇，所至民颂其爱”。说明他外任四次地方官（河南、淮南、荆南、剑南）。四镇中以大历初年除河南尹知东都留守为最早，“居五年，治行（官吏考察）第一”，张彦远书中多次提到其曾祖魏国公（东都河南古魏地）。但此封爵不见于《两唐书》本传，大概是遗漏了。东都河南古魏地，史称德宗对延赏“待遇厚”，卒后“赠太保，谥曰成肃”，在这种优恤的情况下，追赠一个封爵也不是不可能的。

延赏子弘靖。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和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两次拜相；宪宗时封高平（山西晋城）县侯，故被称为高平公。《两唐书》有传。

弘靖子文规。曾刺湖州（浙江吴兴），湖州是上州（从三品）。文规卒于桂管观察使。桂管观察使是州以上道一级的监察使职，大约不低于正三品。正三品即是尚书省各部尚书的官级，彦远称父为尚书，或是因品秩同

于尚书的缘故。其传附在《弘靖传》后。

彦远，文规子。最后官职大理卿（大理寺掌折狱详刑，唐九寺之一，大理寺的首席是大理卿，从三品）。

从张嘉贞起，张家任三品以上的官已连续五世。张彦远是在这样一个家世基础上生活、工作过来的。

（三）彦远经历

《四库提要》所记张彦远经历只根据《新唐书·张文规传》末记张彦远的两句话：“子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中（874～879年）至大理卿。”极为简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法书要录〉条广引文献综合彦远一生经历云：

自宣宗大中之初（847年～）由左补阙（从七品上）为主客员外郎（礼部四司之末司，从六品上），寻转祠部（礼部四司之一）。五年（851年）奉诏修《续唐历》（续8世纪中叶代宗大历以后事），疑其以本官兼史馆修撰也。懿宗咸通初（860年～）出为舒州刺史（中下州、正四品下或从五品上）。久之，复入为兵部员外郎（右三部头司）。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累迁至大理卿。《纪》（《僖宗纪》）于四年（877年）书以殷僧辨为大理卿，彦远此时或已卒矣。

《辨证》又考证了彦远享年：

《名画记》卷一云：“长庆初（821年～）大父出镇幽州，遇朱克融之乱，彦远时未龀岁。”《说文》云：“龀，毁齿也，男生八岁而龀”，则彦远当生于元和十年（815年）前后，至乾符四年（877年），六十余岁矣。

考证一个人的生卒年代，总要有根据。“六十余岁矣”，意思是说已经很高龄了，但不可以说是卒年。

至于彦远撰述，《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尚书故实〉条有云：

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篇末题：大中元年岁在丁卯（847年）。而其卷三叙（浙西）甘露寺壁画云：顾（恺之）画维摩诘，大中七年（853年）今上因访宰臣（令狐绹）此画，遂诏寿州刺史卢简辞求以进。卷十李（渐子）仲和传中亦有今相国令狐公之语。令狐绹大中四年（850年）拜相，十三年（859年）罢，是其书之成不出宣宗之世（宣宗大中十三年八月卒）。《法书要录》虽不著时代，而《名画记》卷二云：今彦远又别撰集《法书要录》共为二十卷，则二书乃同时所作。

前面讲到张彦远享年时，引余先生《辨证》说到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的时间，也兼把《法书要录》时间包括在内，说两书为同时所作。这就是说：张由左补阙历礼部祠部员外郎都在宣宗时。二官官秩虽不高（从七品上、从六品上），但都不是由吏部注拟而是由皇帝亲除，即唐朝所谓“清选官”（或清资官）。左补阙和右拾遗这二官职，是扈从乘舆的谏官，可以面上直言，即直接向皇帝建议。这种官职一般是由地方行政中如县尉或主簿（九品）选拔，这样的官在地方行政中取得许多政治经验，入朝为谏官后，很容易外任要职，再内转为更重要的官职。元和年间，白居易当过左补阙，出作杭州、苏州刺史，后拜河南尹，接着人为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侯。白居易最后以刑部尚书致仕。

员外郎是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长贰”，每司首席叫郎中，长贰是郎中的副手。郎中和员外郎称为郎官，在唐代石刻中有名的石柱《郎官石柱题名》，即是刊刻其题名的石柱^[2]。

郎中和员外郎，他们的职务有人用四句话概括：“予会天下之政，上

可以封还制造，下可以升负牧守，居可以优游殿省，出可以察视违尤。”所以郎官的职位虽然品级不高，但清闲而重要，一直为文人士子所重视。

张彦远所在的主客和祠部均属礼部。前者主要掌管二王后和诸蕃方国朝见之事（唐二王后指北周宇文氏和隋朝杨氏后人被当作客人看待。许多朝代都有二王后的问题，唐朝是指这两家。二王后视为正三品待遇）；祠部主要掌管祠祀享祭事宜，如国庙、大山、大水、僧尼、医药等事。这两个司都是清要之职，可知张彦远当时是很悠闲的，所以写出了《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并参与了大中五年（851年）撰成的《续唐历》的工作。另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记载张彦远尚有《闲居受用》这本书。赵序谓此书“首载居室斋阁应用而旁及醯、醢、脯、馐之属……”估计也作于此时。此书已佚。

南宋初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张彦远咸通初外任舒州刺史时，曾据顾恺之维摩诘的摹本刻石事：“近岁京口都圣与来为建康总领，首询（在瓦棺寺遗基兴建的戒坛寺僧）维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语之曰：‘某守南雄，尝有人示石碣，云唐会昌中杜牧尝寄瓦棺维摩摹本于（汝阳太守）陈颖，张彦远刻于郡斋；某因求陈颖之本，又刻于南雄。尚有墨本在篋笥，当以付子，宜刻之戒坛，庶几旧物复归，而观者皆知顾笔神妙，果如此，亦可以为戒坛之异事。’僧乃刻之。”（《韵语阳秋》卷十四）^[3]这是唐以后张彦远保存古代名家画迹唯一的一处文献记录，遗憾的是此彦远刻石并其墨本皆未见其他著录，当然更不知都佚于何时了。

（四）张家的收藏

张家自张嘉贞始对书画有爱好。不仅喜爱、收藏，而且自己也善书法。《法书要录》自序中说：

彦远家传法书名画，自高祖河东公收藏珍秘；河东公书迹俊异，尤能大书……曾祖魏国公少稟师训，妙合锺（繇）张（芝）尺牍，尤

为合作。大父高平公幼学元常（鍾繇字），自镇蒲陕迹类子敬（王献之），及处台司乃同逸少（王羲之），书体三变，为时所称。金帛散施之外，悉购图书，古来名迹存于篋笥……先君尚书少耽墨妙，备尽楷模。

《历代名画记》卷一也说：“彦远家代好尚，高祖河东公、曾祖魏国公相继鸠集名迹，”卷三还著录了河东公、魏国公、高平公和“河东张氏”的印鉴。张家收藏最富时是在高平公弘靖时。《新唐书·张弘靖传》记“家聚书画侔秘府”，《名画记》卷一载元和十三年（818年）张家敬献皇帝一批书画事：

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钱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家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乃以鍾（繇）、张（芝）、卫（协）、索（靖）真迹各一卷，二王真迹各五卷，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郑（法士）、田（僧亮）、杨（子华）、董（伯仁）、展（子虔）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表上……

可见其所言“家聚书画侔秘府”不是假话。弘靖既是张家收藏最富之时，也是收藏散失时期。除了进献了的精品，剩余的，《名画记》又记：长庆元年（821年），弘靖“出镇幽州，遇朱克融之乱，皆失坠矣。非戎虜所爱，及事定，颇有好事者购得之。彦远时未龀岁（八岁），恨不见家内所宝，其进奉之外，失坠之余，存者才二三轴而已。”

唐末人李绰（亦世家子，与张家交往密切）撰《尚书故实》记载张宾护（曾慥《类说》卷四十五引作“护宾”）尚书口述的张家事迹，尚书“自言四世祖河东公”，可知与彦远同辈，彦远字爱宾，这位尚书字护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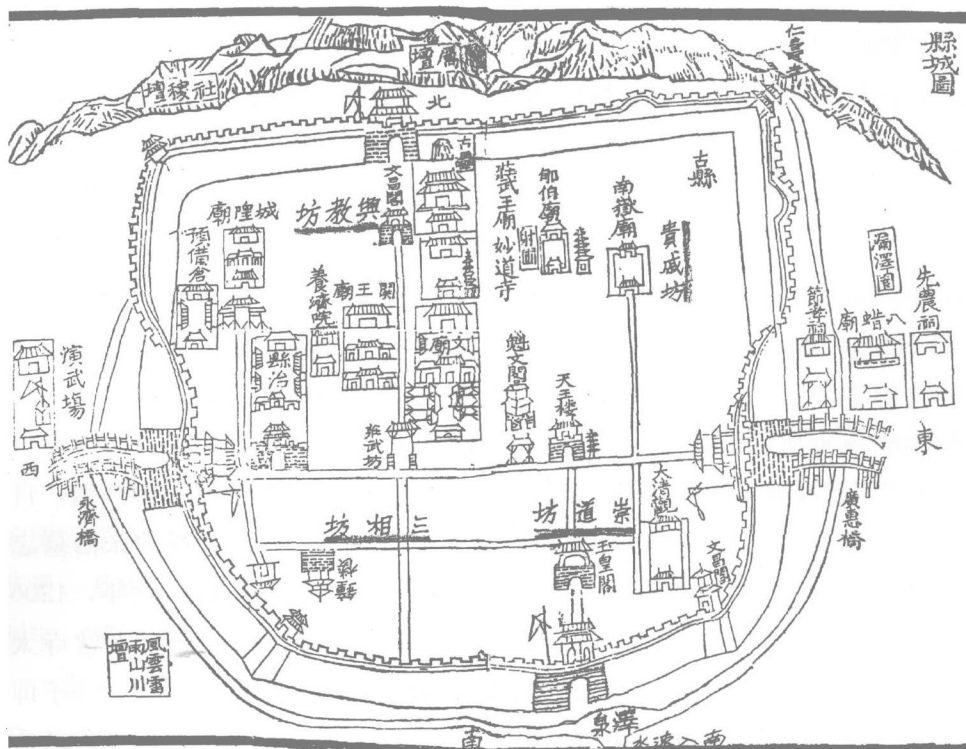
他们应是兄弟行。《新唐书世系表》虽著录了彦远的五位叔伯兄弟名，但无官职和表字，因此不好肯定是谁。余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名与字有相应关系，怀疑护宾“似与（文规弟景初之子）天保之义为近”，但也无法进一步证实。《尚书故实》现存，内记许多张家收藏书画及张护宾本人收藏事迹，由此可知张家从嘉贞到彦远（爱宾）、护宾一代，对书画的收藏、喜爱、鉴赏已历五代了。张家历五世不衰，《两唐书》都有记载。《旧唐书·张延赏传》：“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洛阳南市西南隅，长夏、建春两门交界处）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时号三相张氏云。”五代不易居更可反映张家五代繁盛赓续的长久。

以上是根据《总目提要》的顺序，订补了张彦远家世等问题。现在还想补充张彦远这一辈以后的情况和因三相坊所涉及的猗氏县城布局问题。

张家五世繁荣后随即走向衰落。《新唐书·张弘靖传》后面附张彦远叔次宗子茂枢事迹云：“茂枢字休府，及进士第。天祐中（904～907年）累迁祠部郎中，知制诰，坐柳璨事，贬博昌尉。”（博昌，今山东博兴，沿渤海）柳璨，昭宗、哀帝时相，河东人，与张家是老乡。哀宗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疑柳璨背己，除名论斩。次年朱全忠篡唐建梁。张茂枢因柳被贬以后，史文无征，但可推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而张家的遭遇也可以想见。从武则天晚年赏识张嘉贞以迄唐末，张家兴盛了近二百年，三相张家的后代，史记“群众甚繁”，有些遗属仍归故里河东猗氏，是可以推断的。《宋史·张藏英传》记藏英“自言唐相嘉贞之后”，曾因逆击契丹之功“宋初迁瀛州团练使……建隆三年（962年）卒于治所……孙鑑，自有传”，藏英一支不知是否出自猗氏故里。前引山东济宁发现的张楷墓志（泰定元年，1324年）记：“（楷）父讳普……金泰和丙寅（六年，1206年）……诞于邑（猗氏）之三相坊……金季侨居东平……仕至太常寺太祝，以其子（楷）朝列，公调济州，以禄就养因家焉。配赤盞氏，一子即公也，生于东平之积善坊……皇庆二年（1313年）授朝列大夫大司农丞致仕……泰定改元（1324年）……以疾终，享年八十有二……葬于任城赵村

先茔之次”。墓地近今济宁市南郊，知任城金属济州，张普、楷父子侨居的东平，亦属济州。这样可知 13 世纪初，河东张家有一支由河中猗氏东迁济州者。至于留居在猗氏的张家，检《康熙、雍正猗氏县志》，已无关于张家的记载，但其中《雍正志》卷一〈坊巷里都〉条记：“自明季乱后，东南北三街居民寥落，廛肆俱废，而各乡里都人多逋亡，田半荒芜。”张家星散，大概就出现在明清易代之际。所以今天旧猗氏县城内西南隅保存的三相坊地名和位置应是历史的陈迹。

下面再简述一下猗氏县城的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猗氏县与其西邻临晋县合并，改名临猗，治所设旧猗氏县治。猗氏旧县城据《雍正续修康熙县志》卷前所附县城图（图二），大致如下：



图二 清《雍正续修康熙县志》中的猗氏县城图

《县志》记县城周七里余，四门，东西两门，内有横街相通，南北两门内竖街都止于上述横街，不相通，北门开于北墙偏西位置，南门开在南墙偏东位置。北门内大街在与其相对的横街之南，还连接一条较窄的街道——坊门南巷，向南直抵南城墙。根据其他中原北方旧城街道改变的规律，推测猗氏城这条从北门向南直抵南城的街道，可能是原来的设计，而现在南门内大街约是后来改建的。这个推测如果不误，那么猗氏城内的原始规划应作十字街安排，这就可能是宋金以前的布局了。《县志》记猗氏县为隋代创设，8世纪70年代唐德宗时，河东节度使马燧为防李怀光之叛兴建土城，以后沿用。16世纪中期，明隆庆初始砌砖，以迄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以上记载从城内现存文物看，是可以相信的。首先城内东北隅偏西，尚存两座唐代方形七层砖塔，东西相峙。其后方即北方，有一处高米余的基台上建有奉祠马燧的庄武王庙，俗称马王庙，庙正殿歇山重檐，康熙重建，但多用旧础，旧础覆盆部分施雕刻，可据此断年。最早者雕盛唐流行的简单的宝装莲瓣，其次是若干种变形的宝装莲瓣，再晚些的雕相对环绕的孔雀，后两种应是北宋、金的遗物。可知清重建庄武王庙是在旧建筑台基上，并利用了旧建筑物的构件而兴建的。从庙内所存碑刻等有纪年的文物可知，该庙始建于晚唐乾符六年（879年），北宋、金一再重建；而始建又是在其前兴建的佛寺的基址上改建的，所以庙前方左右还保有晚唐以前所建的东西双塔和大殿还使用盛唐纹饰的柱础。遗憾的是这座佛寺原来名字已失传了。猗氏县城内东北隅有盛唐的大寺院，可推知此城创建应不晚于盛唐。又城内有创建不晚于北宋的天王楼和西塔寺，还有金建的文庙，还分布有北宋和金初的铁人、铁钟和经幢，还有元建的妙道寺，因可知此城宋金元沿用以迄明清。这样就可估计现猗氏旧城的布局至少晚唐以来改变不大，因此前面对城内西南隅的三相坊至晚13世纪即已存在的推测，似乎可以向上追溯，说不定从宋金的13世纪后半，可上推到晚唐，名称也许有不同，张家旧居的位置可能一直未动。能够对一个唐代家庭的大致方位的推定，在历史遗迹上也是较罕见的。如果再考虑天王楼旧址位